

马克思主义哲学

教育方法论研究

倪志安 等 著

MAKESIZHUYI ZHAXUE
JIAOYU FANGFALUN
YANJIU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

教育方法论研究

倪志安 等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来胜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方法论研究/倪志安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

ISBN 7-01-005799-0

I. 马… II. 倪…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学-方法论-研究

IV. 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5520 号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方法论研究

MAKESIZHUYI ZHEXUE JIAOYU FANGFALUN YANJIU

倪志安 等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4

字数:341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5799-0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内 容 提 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方法论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方法的规律性学说和理论体系。本书的立足点是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书的第一章为导论。通过探讨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思维逻辑合规律性的历史发展，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方式、实践逻辑的深刻内涵及其合理性。第二章、第三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是在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活动中必须克服的一系列矛盾，为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基本原则提供根据和支撑点。第四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所应遵循的四大方法论原则。第五章、第六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六个基本方法。这些基本方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依其理论本性的客观要求，又是搞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基本技巧。第七章、第八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应处理好的六大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既是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基本原则的客观要求，也是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践的客观要求。第九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解决的问题。它是教育目标，是实施教育的主体在教育活动中，遵循原则、应用方法、处理好关系而应在教育目标上达到的实际效果，是为本书逻辑建构的终点。

主要作者简介

倪志安，1954年生，四川邻水人。现任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领衔导师。社会兼职有：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聘专家、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等。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方法论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方法论研究，以顽强毅力攻克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多项，撰写具有理论指导和实际价值的科研论文40余篇，出版具有开拓创新性的学术著作6部，其他专著教材9部。在其科学成就中，《毛泽东思想新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分别获四川省人民政府三等奖；《毛泽东思想方法论》获重庆市人民政府二等奖；《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理论来源》（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专著），收入《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选》。有十多篇论文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哲学原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外国哲学与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等全文转载和《光明日报》之《文摘报》、《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摘要推介。

代表作专著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毛泽东思想方法论》、《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毛泽东思想新论》等。代表作论文有《对唯物辩证法实质的新思考》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教人思考的学问。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和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所进行的讲求方法的活动。它既是促进人的社会化、促进人的发展、推动社会前进的手段，又是人为了人而发展人的目的。

衡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是受教育者是否真正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会了像马克思那样思考。

序

——一个意义深远的理论奉献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开始在中国的媒体上出现。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经过一个世纪社会变革的风雨历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深深地植入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不仅成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成为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过程的灵魂,而且在学术上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主导理论。在这百余年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进程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及其成果堪称丰实厚重,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教育也已经遍布中国中学和大学的讲堂。但多少使人感到缺憾和困惑的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方法论问题,却是一个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摆在读者面前的、由西南大学倪志安教授主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方法论研究》,可以说是对这个几近荒芜的园地的一次辛勤的耕耘,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理论奉献。

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首先一个问题是,这个教育应当本着一种什么样的原则精神?倪志安教授的回答是,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依本人之见,这个简约、明了的答案不仅是这本书的立足点和贯穿全书的宗旨,更是一个饱含历史经验教训的和丰富理论内涵的学术主题,因为它所触及的,恰恰是一个自改革开放以来困扰中国学人 30 年的一个理论问题,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符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吗?

我们知道,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大约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主要地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方式存在。而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在其一生的理论著述中,并没有写过一本集中地、系统地论述自己哲学思想的著作。除一些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外,他的哲学思想比较多地是体现在他的经济学著作和社会理论著作中。恩格斯为了总结所处时代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发展的成果,为了同各种类型的唯心主义思潮进行论辩,曾写下了《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名著作。这些著作中所阐述的理论观点对后来形成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界围绕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和观点展开争论。此间,斯大林于1938年9月发表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定了调子。此后,苏联哲学界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和理论建设、哲学教学的需要,以斯大林的论述为基础,围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作出了许多努力,形成了不同版本的哲学原理体系。这些“原理”体系很快传入中国,成为中国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基本教材。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分裂乃至对抗,我国政府的教育部门组织我国的学者编写自己的原理教材。这就是我国哲学家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然而,这部教材除了增加一些中国哲学的素材和结合了我国社会发展现实外,亦没有大的突破,总体上仍然是苏联教材的翻版。

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理论观念从他们的著作中提炼出来,按照一定的理论结构整合起来,形成一部哲学教材,原本无可厚非,这不仅对于在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作为一

种哲学观念、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也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这个被冠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体系在其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以及由这种时代局限性所衍生出来的各种缺陷,即它本质上是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产物,它一经产生就超出了哲学学术的范围。其意识形态功能远远大于它的学术价值,或者说政治性大于学术性。“原理”体系的这一特征在哲学学术领域中造成了十分顽固的教条主义学风。教条主义表面上看是学风问题,但从根源上说,则是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必然产物。一旦一种哲学理论被放置在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上,就具有了不可改变、不可动摇的性质,因为任何变动都会带来思想混乱。如果一个社会体制能够真正地倡导学术自由、学术民主,教条主义是没有存身的余地的。

学风上的教条主义使这个通行多年的“原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缺陷。其中比较严重的缺陷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原理体系不能真实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精神,甚至在一些重要的原则性的基本哲学观念上,背离了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第二,受“左”倾思潮和教条主义的支配,不能真正地反映、吸收、消化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不能认真研究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所提出来的各种哲学问题,使自身远远落后于科学文化的发展。第三,不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待现代西方哲学文化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不加认真研究分析地否认西方哲学文化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成果。第四,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发展的现实。总而言之,这个原理体系基本上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至少包含着大量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和曲解。正是由于这一点,学界不少学者很早就提出了“回到马克思”这样一个颇有争议的口号。依本人之见,“回到马克思”无非是要达到一个简单的目的,那就是从“教科书”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文本,要从马克思的文本中去重新发现和理解马克

思的理论,而不能盲从教科书的文本。正如我国学者张一兵所言:对“回到马克思”的拒绝潜藏了一种理论无根性的恐慌,这是很有道理的。当然,不能低估“教科书情结”在我国的顽固性。在我国绝大多数非哲学理论工作者或政府官员,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都是来自这本教材,而不是来自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认真解读,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早已摆在中国人的书架上了。有时事情竟然荒唐到这样一个程度,如果马克思的文本理论与教科书的观点发生冲突,很多人宁可相信教科书,也不相信马克思。我现在依然有理由说,如果我们不“回到马克思”,那就有可能回到教科书,而一旦如此,那不仅扼杀了理论界长期讨论的成果,而且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动。

由此看来,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的确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主题,更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方法论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方法论研究》一书的作者倾注了自己的心力和笔力。如在“导论”中,作者在比较深入、比较系统地研究和比较了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发展演变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作出了很富有启发性的诠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界定为“实践思维方式”,并指出:“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创新性思维方式。理解了实践思维方式,就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本质;把握了实践思维方式,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和精神实质。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属人存在,理解、诠释和评价一切相关哲学问题的根本思维方式。”在第二、三章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时,作者深刻地批判分析了“传统教科书”物质本体论的局限和问题,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看来,哲学所应关注的世界,不是与人无关、不属于人的自然世界(物的世界),而是与人有关、属人的,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

和发展的属人的世界或人的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本质上是实践的关于属人世界、人类世界的本体论”,这些观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和实质精神的重新理解。显然,这些观点既充分体现了二十余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同时又是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的思想结晶。

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的基础上,作者进而对何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进行了相当系统的探讨。应当说,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拓荒的性质。哲学教育不同于科学教育,尽管哲学教育也像科学教育一样向人们传授知识和理论,但它所传授的东西不像科学理论那样仅仅是在经验范围以内并能被经验所证实或证伪的理论知识,而是通常具有超验性的理论知识,因而我们很难用科学教育的论证方式来论证哲学的理论知识。此外,科学教育是重视事实的,必须在价值上保持中立,而哲学则不仅传授知识和理论,更重要地是,它要引导和推动人们对自己的生存本性、生存价值或意义进行反思理解。当然,在这一点上,哲学教育也不同于艺术教育和宗教教育,因为它必须且只能运用概念和逻辑的力量来直陈有关世界和人生的“真谛”,而不需要或并不必借助鲜活生动的感性形象和寓意微妙的宗教表象。^①哲学教育的上述特征构成了哲学教育的特殊困难,因此有必要探讨哲学教育的特殊方式。

哲学教育是如此,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更是如此。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方法论研究》一书的作者所作的尝试性努力是令人称道的。在这本书中,作者沿

① 在这里,借用了黑格尔的看法。黑格尔认为,艺术、宗教和哲学都是对绝对理念的把握。不过,艺术使用感性形象来把握理念,宗教是用表象来把握理念,哲学则是用概念来把握理念。

着自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的探讨,系统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其基本原则包括实践思维方式与实践逻辑相结合原则、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原则、坚持和发展相统一原则和学会思考与学会做人相统一原则;其基本方法包括实践世界观与实践方法论相结合方法、实践唯物论和实践辩证法相结合方法、实践自然观与实践历史观相结合方法、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相结合方法、实践真理观与实践价值观相结合方法、实践哲学观与实践人生观相结合方法。不难看出,这些原则和方法的内容几乎囊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方面面,体现出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完整理解。在这些原则和方法中,贯穿始终的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正如作者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基本原则时所说:“马克思以实践思维方式思考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问题,认为人的思维所把握的存在,是受实践规定的在实践中生成发展的属人自为存在,本质上是人通过自己的自由自觉活动所创生的实践存在。与以往的思维逻辑不同,马克思的实践逻辑是符合属人存在物自身生成、发展的那样的思维逻辑,是在本然与应然统一的意义上合理解存在、正确把握和评价存在的逻辑,是恰当地运用概念反映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逻辑,是按实践存在生成和发展那样进行思维的实践逻辑。”应当说,这无论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还是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来说,都是最具根本性的观点。

很多年来,我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经常与学生谈论这样一个看法,即对于我们这些哲学工作者来说,最应弄清两个问题:其一,怎样一种思维才是“哲学思维”?其二,这种思维为什么是必要的?第一个问题涉及我们对哲学本性的理解,第二个问题涉及哲学本身的存在价值。老实说,我本人至今仍在苦苦地思索着这两个问题。倪志安教授主撰的这本书,给了我很多启发。这是我应当对他表示感谢的。相信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也都会有此同样的感受。当然,正

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问题,即便对于许多搞哲学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陌生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可谓问题丛生。这本书的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就是把更多的人引入这个领域,让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阎孟伟

2006年夏,于南开大学

题 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凤凰涅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不是西方传统哲学意义的关于自在世界的世界观,而是关于现实人的活动世界即人类世界(属人世界)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理论所彰显的正是人对自己活动的对象化世界的正确理解、把握和改造的方法论的属性和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从它是主体有计划、有目的的育化、塑造自身的实践活动说,它既是促成人的社会化、促进人的发展、推动社会前进的手段,又是人为了人而发展人自己的目的;从这种主体活动的内在规则、程序、途径等活动方式说,它又是一种讲求方法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方法论所研究的主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活动中的方法的规律性,一方面它取决于人的存在发展规律和人的教育发展规律的规定;另一方面它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的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则是由它成为其自身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实践的思维方式、思维逻辑、理论意蕴和理论诉求所规定的。

本书的立足点是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可仔细考究起来,自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以及按照这种教科书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恰不是在一般的问题上,而正是在这个关键、实质的问题上,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由之决定本书的一个历史使命是:重新认识、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重新理解、阐释由这个马

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所规定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而要这样做则离不开对人类哲学思维把握存在的思维方式、思维逻辑合规律性发展的真切认识,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的把握,变成了包含马克思以前的整个西方哲学特定方法论内容的探讨。余以为本书在这方面的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突破和创新,对于我们当前正在着力进行的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理论形态,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作为讲求方法的活动,在我们以往的学术研究中一直未能给予关注。尽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著名哲学家高清海、李秀林等曾倡导人们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方法论的研究,但迄今仍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学术园地。由之决定本书的另一个历史使命是:在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探究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应处理好的重要关系和在教育目标(效果)上应解决的问题。这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方法论的系统研究,由于它自身的开拓性质,余以为不仅对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方法论新学科,从而推进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有重大理论意义,而且对切实搞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有重塑我们的哲学教育理念、改革哲学教育的重大实践意义。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诠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和育人中亦起过非常重大的历史作用,但由于它未能传达出真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理论意蕴和理论诉求,这就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具体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我们中华民族总是善于创新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化,使中国人民站

起来;邓小平理论指引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国化,使中国人民富起来。在小平带领我们走进的这个新时代,从前苏联搬过来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我们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所否定。而同样是从前苏联搬过来的为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理论支撑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迄今仍被许多理论工作者奉为一成不变的教科书、抱住这种昨天的理论不放。当代中国人正以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迈进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时代,难道我们就没有勇气终结由前苏联人制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理论形态,创生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理论形态!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说,我以为历史已行进到这样一个转折关头,传统教科书旧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结和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在这种历史性的凤凰涅槃中获得新生。

本书的研究大纲、研究内容、基本观点均由本人拟定,由于它的所信奉的唯一原则是“求是”,在不少地方把话说得很满,这是为了必要的触动和震撼。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方面自以为是的突破和创新,均属个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研究的见解,有不足、缺陷亦在所难免,倘有争议或非难的责任也理应由本人承担。本书的具体研究和撰写是:第一章“导论”、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存在的困难”、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一、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相结合原则”、第五章“一、实践世界观和实践方法论相结合方法”、第六章“一、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相结合方法”、第八章“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第九章“一、确立实践的世界观”和“二、塑造实践的方法论”,由西南大学倪志安撰写。第四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基本原则”中第二、三、四节,由中共江西省纪委罗国华撰写。第五章“马克

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基本方法(上)”中第二、三节,由重庆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程科撰写。第六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基本方法(下)”中第二、三节由重庆师范大学杜家庭撰写。第七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处理好的关系(上)”,由重庆通信学院马腾撰写。第八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处理好的关系(下)”中第二、三节,由第三军医大学李勇强撰写。第九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解决的问题”中第三、四节,由南京大学在读博士后孙道进撰写。全书由倪志安统稿,罗国华和安徽理工大学王宏兴、重庆志成学校倪志杰为本书作了资料、技术方面的重要贡献。

本书作为重庆市文科研究基地重点课题的成果,在研究、撰写和出版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国内外专家学者可资借鉴的文献资料,惠得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鼎力经费资助及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作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倪志安

2006年6月26日于志成大厦